

台海文学研究丛书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

刘红林

著

台海出版社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

刘红林
著

ISBN 7-80141-446-2



9 787801 414465 >

ISBN 7-80141-446-2

全套定价：38.00 元（全二册）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

刘红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 / 刘红林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12

(台湾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80141-446-2

I. 日... II. 刘... III. 日据时期—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 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184

丛 书 名/台湾文学研究丛书

书 名/日据时期台湾文学风貌

著 者/刘红林

责任编辑/谢香

装帧设计/台城柳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文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数/17.625 字数/442 千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1-446-2

全套定价: 38.00 元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序 言

金坚范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同样，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甲午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纸马关条约割弃了整整一个宝岛台湾。台湾从此沦为日本殖民地达 50 年之久。那是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部分，是海峡两岸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悲痛记忆。台湾光复之后，两岸又处于政治对峙之中。金甌有缺不是民族的光荣，而是民族的悲剧。

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两岸存在着政治上的藩篱，但台湾和祖国大陆血脉相贯、根叶相连，即使海峡再宽也无法阻隔，因为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于民，沐浴在同一条文化传统的大河之中。任何人无法须臾离开传统而存在，任何民族也无法割断自身的文化脐带而存在。海峡两岸的人民，其深层处，其潜意识里，绵延着中华文化的悠长传统，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基因是相同的。这一事实就连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也不得不惊呼。大约在 1935 年，台湾总督府编纂了《台湾警察沿革志》。其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本岛(台湾)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方



面仍沿袭旧貌,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民族意识……本岛人又视(福建、广东)为父祖坟墓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故自改隶后,……仍有一些本岛人频频发出不满之声,以至引起许多不祥事件,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主要原因……”(《台湾社会运动史》卷一,创造出版社,台北,1983)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曾经以灿烂的古代文明向世界做出过无以伦比贡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畏强暴、不甘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民族。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也是台湾光复 60 周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起了抗御侵略者的长城。就连佛教胜地五台山的和尚都发出了庄严的宣告:我们虽然出家了,但我们没有出国,我们也是中国人,也要抗战!

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台湾也是薪火相传的。从 1895—1945 年这 50 年间,在残暴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政治反抗前仆后继,与之相互呼应的保卫民族传统文化和反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斗争也持续不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台湾同胞除了在岛内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外,还有 50,000 余人跨越海峡回到祖国大陆参战。这 50,000 多将士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再一次说明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关系。诚如刘红林在本书结尾时所引时任台湾文艺联盟委员长张深切先生 1937 年所讲的话,“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的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他们不就是杨逵先生所描写的“种在黄花缸上,长得很茂盛”的 50,000 多枝的玫瑰花吗?!



余光中先生曾形象地将屈原投水殉国的汨罗江比喻为蓝墨水的源头。的确，汨罗江哺育了李白、杜甫、鲁迅，也哺育了丘逢甲、赖和、杨逵、吕赫若。萧乾先生曾说，美国记者斯诺读了鲁迅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后，“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了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在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伤痕血迹”，同样的“倔强高贵的灵魂”。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整体。两岸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文化母体，共同汇合成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

研究文学，要从文本出发，要从作品所处的时代、历史和文化传统出发。但文化领域里的一些分裂主义势力，总是以“台独”意识为基准来对台湾作家进行扭曲。犹如瞎子摸象，他们以偏概全，抓住一点，或任意拔高，或恣意贬损，真可谓随心所欲。刘红林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对日据时期台湾主要作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梳理和辨析，批驳了“文学台独”派的种种谬论。我们更要看到，崇尚统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历朝历代，都在是否坚持统一问题上区分明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爱国与卖国，英雄与败类。你看，今年以来，随着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组团访问祖国大陆，使两岸关系又产生了一些积极因素，再次说明谋求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分裂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的斗争依然严峻而复杂。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然与政治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与“文学台独”的斗争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但我们坚信，任何阻挡历史潮流的人，最终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



目 录

前言: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

上篇: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发展综述

第一章 台湾新文学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8)
第一节 残酷的殖民压榨·····	(8)
第二节 心向祖国的抗日运动 ·····	(13)
一、武装抗日·····	(14)
二、政治抗日·····	(16)
三、文化抗日·····	(23)
第二章 倔强的灵魂的民族文学运动 ·····	(28)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	(28)
第二节 白话文运动 ·····	(37)
一、运动的先导 ·····	(38)
二、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	(40)
三、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	(44)
四、白话文运动的实绩·····	(46)
五、台湾白话文运动的特殊性·····	(48)
六、台湾(白)话文运动·····	(52)
第三节 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欧美文艺思想的引进 ·····	(61)
一、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的介绍 ·····	(61)
二、新文学作品的展示 ·····	(64)



第四节 新旧文学论争	(67)
一、旧文学的腐朽	(67)
二、张我军与新旧文学论争	(73)
三、来自新文学阵营的声援	(82)
四、意义与影响	(86)
第五节 与新文学有关的重要报刊	(88)
第三章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创作概况	(124)
第一节 成长期的文学实绩	(124)
一、奠基性的小说创作	(124)
二、新诗和散文的不俗表现	(126)
三、戏剧的兴盛	(130)
第二节 繁荣期的文学盛况	(137)
一、小说创作长足发展	(139)
二、新诗运动蓬蓬勃勃	(140)
三、散文和戏剧的进步	(145)
第三节 战争期复杂的创作面貌	(148)
一、“皇民文学”的发生及其实质	(148)
二、“迈向皇民之道”——皇民文学的具体表现	(150)
三、在“皇民文学”的幌子下隐寄反抗和阳奉阴违	(162)
四、杨逵深埋在底层的抵抗	(178)

下篇：代表作家评析

第四章 “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182)
第一节 铁骨铮铮的爱国者	(182)
第二节 以笔为旗的小说	(187)



一、思想主题——发生在殖民暗夜里的悲剧	(187)
二、艺术成就——划时代的创新与开拓	(194)
第三节 为民众呐喊的新诗	(206)
一、丰富多采的诗歌主题	(206)
二、卓越不凡的艺术成就	(215)
第五章 才华横溢的薄命诗人杨华	(223)
第一节 生平与小说创作	(223)
第二节 早期诗歌及代表作《黑潮集》	(226)
第三节 其它诗集及散篇	(237)
第六章 “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	(244)
第一节 早期经历与活动	(244)
第二节 反帝反封建的小说内容	(246)
一、以深沉的控诉力量揭露鹰犬恶行	(246)
二、摹写乡土苦难,抒发民族悲情	(249)
三、惊醒民众,激励人心,鼓舞斗志	(252)
第三节 瑕不掩瑜的艺术风貌	(257)
一、形象化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	(258)
二、生动典型地展现人物性格	(261)
三、以多种手法丰富现实主义创作	(263)
第七章 乡土的真挚代言人杨云萍	(266)
第一节 杨云萍的开创之功	(266)
第二节 尝试期的小说杰作	(269)
第三节 潜藏深意的唯美主义新诗	(273)
第八章 “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	(284)
第一节 革命与创作的一生	(284)
第二节 殊途同归的反封建指向	(288)
第三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父”意识	(291)



第四节 被封建父权“吃掉”的女人们	(297)
第九章 文学赤子龙瑛宗	(307)
第一节 “文学长跑者”的独特人生	(307)
第二节 龙瑛宗小说——殖民统治下小知识分子的悲歌	(312)
一、文学主题的重大改变	(313)
二、灰暗而没有希望的形象群体	(315)
三、自私、幻想、懦弱的性格悲剧	(320)
第三节 龙瑛宗笔下的女性形象	(325)
第四节 龙瑛宗笔下的民俗描写	(333)
第十章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	(337)
第一节 生平与前期创作	(337)
第二节 《亚细亚的孤儿》之我见	(342)
一、从顺民到战士——胡太明的人生走向	(342)
二、“孤儿”意识的克服——胡太明的性格发展	(348)
三、鲜明的对比——在臧否人物中寄寓深意	(353)
第三节 吴浊流小说中的民族传统之根	(358)
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爱——代结束语	(361)
主要参考文献	(369)
后记	(371)



前 言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

新文学是在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国家都曾有过的文学革命。它初起的时候,都是各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思想武器。而启蒙运动,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从思想上扫清封建社会造成的蒙昧无知,启发理智,由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

欧洲的启蒙运动始于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4—16世纪。这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整个欧洲被罗马天主教会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制度体系。神学和宗教高于一切,其势力和影响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哲学、文学、艺术等,也只是从不同角度诠释神学、赞美上帝,成为宗教愚化人民的帮凶和工具。在神学极度张扬的同时,人的地位被尽量贬低。教会主张人应该抛弃尘世间的全部欲望,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以便死后灵魂能够进入天堂。而这种人为的张扬和贬低,都是以迷信与愚昧为前提的。如果人们掌握了科学的思想利器,教会所宣扬的一切就会不攻自破,封建政治体制也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因此,科学与知识就成了教会的死敌,所有先进的思想和新的发现都被其极力扼杀,因之而惨遭杀戮的思想家、科学家不乏其人。针对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先进的思想家们张起启蒙主义的大旗。启蒙主义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芽到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和皇权、以理性探索为原则、以个性解放为目的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在欧洲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它以复兴古希腊文明为名,行与宗教神学针锋



相对之实,倡导人文主义,一切以人为中心,人的利益高于神的利益,要求重视现实生活,重视物质享受,要求发展人的个性,把人的思想和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继文艺复兴之后,18世纪又以法国为中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次运动打出了“天赋人权”的旗帜,在人文主义肯定和歌颂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强调人人生来自由、平等,打破了君权至上的迷信。同时,百科全书的编纂对于打破迷信具有特殊意义。这次启蒙运动,促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很快觉醒,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不同于欧洲的特点。法国大革命是在长时期启蒙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觉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封建愚昧不再能够左右他们的思想后,再由成熟而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领导,从王公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明治维新为标志,虽然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是一场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从而使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跃升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此之前缺乏大规模的用西方近现代的先进思想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则是在西方的欺侮和虎视眈眈之下被迫“开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这一切,决定了日本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差异,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并由明治政府推动的运动,旨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由政府实施“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吸引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如汹涌着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日本。

中国的启蒙萌芽于明末清初,而它成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是于近现代,最有成效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与日本的启蒙运动有相同之处,都是在西方的欺侮与压力下,被迫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不同的是,日本是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而中国,由于封建主义体系的完备和强大,也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不足



及软弱,由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发动一场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最好的例证,正如梁启超所说:“在一个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民众大部分是文盲的国家里要孕育一场政治运动将会出现下列危险:这个运动会被政客和政党为自身之目的所操纵。大多数民众将不会有那么高举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了,也将受一种乌合之众的情绪而不是理性思考的支配。”^①因此,“立人”被中国的启蒙主义确立为自身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它既包括人文主义早期所主张的对人(和世界)的发现,也包括启蒙理性高扬期对人的探索,而又似乎更强调人的塑造——人格的自我塑造与人格的被塑造。这“立人”的“立”字,“代表了民族性的独特的启蒙意向。它首先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在中国从未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目前的任务是‘辟人荒’。因之,中国的启蒙者必然地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探索人的解放的命题”^②。

由于启蒙思潮是时代文化心理、思想精神层面上的革命要求,而文学艺术又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文学思潮一方面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形象化的审美载体,同时又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加入到启蒙思潮的发展嬗变流程之中;另一方面,启蒙思潮也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精神上、审美上的内在推动力。二者相互作用彼此推动,共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以不朽的宏篇《神曲》,大胆地抨击了教皇和僧侣的丑恶行径。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各国纷纷出现张扬人的个性、赞美人、肯定人的欲望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作者如莎士比亚、薄伽丘等

① 引自〔美〕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第8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也因之彪炳史册。日本的启蒙运动由于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它的审美载体文学,也由政治小说到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私小说等,呈渐进改革,没有经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文学革命,或者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中国的启蒙运动是由先进的思想家们在国难当头之时觉悟而为之,其最大的特征是毫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因此,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了自审、审父意识,强调的是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

在“五四”运动发生时,台湾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二十多年。表面上,日本人把资本主义引入台湾,被今天台湾的某些亲日派、台独派尊为“进步”。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包括丰富内容的制度,涉及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等许多范畴,以科学、理性、民主、人道的方式启蒙人们,的确是比封建主义先进得多。但是,日本输入台湾的资本主义,与当时西欧与它本国的资本主义都不相同,属于“前资本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殖民资本主义”,靠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起家,从而完成基本的原始积累后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日本在台湾建立的,只是片面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关系与制度,这同英国、法国占领了非洲大陆以后,掠夺殖民地资源一样,只是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转嫁本国经济危机的管道。这种片面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后果,直到殖民地不复存在以后很长时间,都还继续发挥影响。例如今天非洲的经济还是非常脆弱,西方国家只要一打喷嚏,它们就要大病一场。同时,宗主国可以用军事手段作为经济的辅助,从而达到永远控制殖民地的目的。同样,日本对台湾 50 年的殖民统治,给予台湾人民的是无穷的精神戕害,而无经济发展方面的助力。这种片面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后遗症直到 70 年代,台湾调整产业结构,经济重新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时才有所改观,但至今也未能完全消除,比如,日本对台湾的贸易始终是顺差,今天仍很突出。

日本在台湾的资本主义化,尽管实质是资本势力借助政治强



权进行殖民掠夺,但无论如何,都对台湾原有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有一定的松动。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统治政策,将掠夺台湾资源的魔爪伸向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乙未割台后不久,总督府即行土地调查、林野调查,把台湾的大多数可耕田收夺归为官有,廉价配售给日籍资本家、退休官员,少部分土地则在地主手中。台湾农民基本上是佃农、长工或短工,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极为少见。从1920年到1930年这十年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经济恐慌,在殖民者盘剥下的台湾农民更是陷入了困境。进入30年代,殖民当局强化了它在台湾的土地掠夺、产品垄断,以便扩充农业实力,一来支援日本本土的工业发展,二来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便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或土地耕种权。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或进入日本人制糖业,或到城市去谋生。同时,民族矛盾虽然造成台湾地主阶级的实力有所削弱,但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基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不仅仍然为害社会,而且还与殖民资本主义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地共同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这种“合谋”进行的压迫和剥削,是由它们共同的本质所决定的。

日本当局在台湾也未能像在它本国那样,进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需的文化、思想方面的启蒙。这是与它当时统治和治理台湾这个它获取的第一块殖民地的理念密切相关的。日本帝国占据台湾后,立刻派遣了大批官员前往印度,全面地考察了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他们发现,正是由于思想、教育方面的启蒙,逐渐在印度的上层知识阶层中蜕变出了一个反对宗主国统治者的精英阶层,这些人既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又了解本国的具体情况,逐渐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内部瓦解力量,这些精英也多成为本民族反殖民的领袖。所以当时帝国的官僚机构,在委派历任台湾总督时,特别强调防患于未然。殖民当局对英国统治印度的方式做了很大的修正,始终以“教化”或“驯化”台湾人民效



忠日本帝国为目的,例如通过强制性地推行“国语”(日语),而创造奴化人民的所谓“现代”的文学、艺术,对其他方面的启蒙则一概予以抛弃,以免重蹈英国的覆辙。

所以,台湾在日本统治下 50 年,社会性质只是把原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一直是台湾现代启蒙运动的两大任务,这就决定了台湾的启蒙方式不可能与它的祖国有太大的区别。何况,台湾人从父祖那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禀赋、思维模式、心理积淀是在中国式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其他中国人大体相似,顶多只是殖民化程度上的不同。他们若要求生存、求解放,求自由,非得以中国人的方式进行中国式的革命。同时,新文学的启蒙性质也决定了台湾新文学必定与中国新文学同质,因为,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启蒙的环境、条件、对象、过程,都与中国不同,这是由社会性质与民族特性等先天因素所形成,决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启蒙运动,它的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步骤,与祖国大陆基本相同,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前人曾称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台湾版”^①，“殆是原原本本抄袭五四后的文学革命运动”^②,受大陆影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同种同根、社会的同质同构。否则,台湾同时也受到欧美、日本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发生“文艺复兴运动的台湾版”或“大正文学的台湾版”?因此,台湾新文学无论受哪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影响,用哪一个国家的语言创作,它也只能有一个特质——中国属性。这正是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基本属性。

① 叶荣钟:《台湾人的唯一喉舌——台湾民报》,引自李南衡主编《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台湾〕明潭出版社 1979 年 3 月 15 日出版,第 220 页。

② 王诗琅:《台湾·祖国的文化交流》,转引自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0 年 5 月版,第 32 页。